

「譯者·譯事·譯史」專題引言

陳宏淑*

在東亞近現代史中，翻譯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文本的旅行造就了知識的傳播與觀念的啟蒙，語言的轉換促成了人際的溝通與國際的交流。無論是蓬勃進行的譯事活動，或者是孜孜不倦的口筆譯者，其不可小覷的力量，推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浪潮。這些近現代史中推波助瀾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是本次專題關注的焦點。本專題希望藉由這類譯史研究，為這種充滿衝突、交混、融合、再生的過程，建構出更清楚的譯史面貌。

主題先從譯者談起，是刻意要呼應翻譯研究自上世紀末以來的趨勢，也就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所呈現的抵抗精神。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古今中外，翻譯活動從來不曾停止過。關於翻譯活動的記載，在《冊府元龜》的《外臣部·鞮譯》記有周代的翻譯史實，其中提到「周公居攝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喻說焉。』」越裳在交趾之南，與漢地相距遙遠，語言不通，所以只能藉由翻譯與中原互相往來，譯者角色之重要自然不在話下。然而，自古至今獻身於翻譯事業的譯者，能夠名留青史的實在不多。譯者被遺忘被忽略，當然與翻譯

* 作者現任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

長久以來的次級地位很有關係。因此，改變譯者的隱身狀態，提高譯者的主體性與能見度，便成了當今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精神。

把這種精神應用到譯史研究，便促成研究者開始根據蛛絲馬跡，一步一步蒐集資料與文本，把這些譯者的名字找出來，細心調查他們翻譯活動的始末與過程，結合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分析他們譯事的特殊之處，讓我們對當時譯事的可能情況得以多一些理解，例如一個文本如何從歐洲到美洲再傳入亞洲，一位文人如何在譯者的協助之下探查殖民地的奇風異俗，一套系列叢書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張冠李戴，或是一個現代化的概念如何與異地文化產生互動。每一次的譯事活動，都代表了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交會，外來的新觀念要進入舊有的體制文化，也必然產生接納或抵抗或兩者之間種種交混變種的可能。當研究者抽絲剝繭，仔細描繪這居間的豐富性與複雜度時，其實也是在建構一段不斷變化的觀念史。

當然，為這些譯者及其譯事活動寫史，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任何歷史書寫都是片斷不全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論述提到：「過去的真實面貌一閃即逝，只有透過剎那間出現的影像才可能抓住，在那瞬間，過去依稀可見卻從此不再出現。」¹但即便所謂的再表述都不可能是「真實」的再現，即便真正的歷史無法再現，所有的再現都是一種再創造，本專題的研究者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因為抓住那「依稀可見」的吉光片羽，重新建構那些失落的記憶，對於東亞各國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成果而言是極為重要的。晚清時期的中國、明治時期的日本、日治及戰後時期的臺灣，這三地彼此之間在十九及二十世紀的複雜糾葛，以及與西方思潮的直接或間接接觸，在在都形塑了現今東亞社會的政治與社會風貌。試圖了解這些過去，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審視現在，展望未來。所以，就讓我們就從戰後的臺灣開始回頭看吧。

¹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p. 255.

本專題第一篇論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撰寫，題目為〈被遺忘的功臣：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者〉。這篇論文主要呈現的是日本譯者事跡被掩蓋的事實，作者經過詳細比對，證明東方出版社於1960年代出版的四套兒童叢書，其源頭實際上是來自日本的改寫者。然而，這些日文譯者卻因「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治因素而被刻意隱瞞，以至於當今兒童文學研究者在研究文本時，忽略日譯者可能造成的影響，也簡化了臺灣譯本與原著之間的關係。除了重新找回日譯者的名字之外，作者也整體地呈現一幅譯者群像，讓我們除了知道譯者個別的背景經驗之外，也能看出譯者在選材與翻譯改寫策略方面呈現的某些趨勢，而這些共同現象突顯了那個時代的特殊性，並且彰顯了日本在臺灣兒童文學史的重要性。

日本對臺灣的重要影響，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在殖民時期的語言教育及文化滲透之後，日譯兒童文學才會自然而然成為戰後臺籍譯者尋求題材的源頭。本專題第二篇論文處理的時空便是日治時期的臺灣，題目是〈譯者與他者：以佐藤春夫的臺閩紀行為例〉，作者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楊承淑教授。這篇論文處理的主題同樣是文人与異國文化的互動，不同的是，佐藤春夫這位日本作家是透過為他導覽臺閩地區的譯者，來凝視旅程中經歷的人事物，進而透過書寫而記錄所見所聞。口譯史的研究向來困難，因為口譯的產出結果如果沒有記錄下來，口譯者說的話在翻譯活動的當下就隨風而逝，不像筆譯者的譯作可以出版，然後流傳下來作為後人的研究材料。作者設法克服資料蒐集的困難，仔細爬梳前人文獻及佐藤留下的書寫紀錄，拼湊出三位重要譯者的生平及譯事活動，同時也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譯者與作家的彼此牽引與依賴，而不讓享有文學盛名的作家專美於前。譯者的主體性在這篇論文的探討中明顯可見。

臺閩之行的深刻印象，成為佐藤春夫文學創作的泉源。對異國情調的凝視與書寫，同樣也在譯介異國文藝的中國報刊上發揮作用。本專題第三篇論文〈咨爾多譯，為民前鋒：《前鋒月刊》中的異國文藝

譯介與國族想像》，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碩文。這篇論文以《前鋒月刊》為個案，觀察1930年代中國的民族文藝運動者如何透過凝視與書寫，形塑新的民族自我想像。作者由「民族」這個概念出發，進而探討「民族」如何成為文藝運動的重要命題。中國自晚清以來受到的壓迫，自然是促成民族文藝運動的一股動力。譯介異國文藝成為一種方法與手段，也是一種革新的力量，從觀看他國文藝作品的眼光中，投射出中國終將迎頭趕上的希望景象。翻譯活動之蓬勃發展，連帶也影響了創作活動的方向，帶有異國情調的黃震遐作品，顯然也加入了民族文藝運動的行列，致力於塑造新的國族形象。

晚清中國想要圖強求變，文藝作品固然可以凝聚民族共識並激發愛國情操，但社會科學著作的譯介，更可以啟迪民智，幫助中國學習西方的社會制度，進而破舊立新，使中國邁向國富民強。都市自治著作的翻譯，似乎就是傳遞西方新思維的一種途徑。本專題第四篇論文〈都市自治著作翻譯與集權式自治制度的互動——以門羅（W. B. Munro）的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an Cities* 及其日、中譯本為中心〉，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祁梁，討論的就是這樣的一種翻譯途徑，以及此途徑與實際自治制度傳播之間的落差。作者先討論「自治」一詞自晚清以來的內涵脈絡，又透過目次、用詞、段落的比較，釐清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an Cities* 的轉譯路徑。然而哈佛大學門羅教授的這本著作，儘管透過日譯本輾轉引介至中國，其影響力似乎不敵普魯士與日本制度之集權性格。社會體制的改良，顯然無法單靠思想的譯介與傳播，也無法純粹移植或複製，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詞語或概念，也無論是思想或制度，日本絕對是中國向西方取經的一個重要窗口。

門羅的著作透過日譯本而轉譯至中國，這種轉譯的情形在晚清時期絕非少數，甚至可以說俯拾皆是，蘇曼殊的《慘社會》即為一例。本專題第五篇論文為〈蘇曼殊《慘社會》的底本研究〉，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強勇傑。他以《慘社會》為研究

對象，進行跨語言及跨文本的比較，解開此書身世之謎。相較於前人研究僅由蘇曼殊的語言背景或當時的社會脈絡加以推測，作者採用的文本細讀法，才是真正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其考證的過程有如偵探辦案，任何細節都不放過，可說是文本轉譯史研究的詳細範例。此一個案的意義，不僅在於展現單一文本從法國到美國再到日本而進入中國的歷程，更在於勾勒出一條從歐洲到美洲再到亞洲的旅行路徑，在這條路徑旅行的不只是小說這種新文類，還有新觀念（例如雨果作品的人道主義）、新制度（例如前篇論文的都市自治著作），而日本自始至終都扮演一個篩選、仲介、示範的角色，促成西學在東亞的開枝散葉。

本專題最後一篇論文為筆者所寫，題目為〈傳話遊戲：一個層層轉譯的故事〉，探討的是旅行在這條路徑上的另一個文本 *Cuore*。這個故事從義大利傳到美國，然後傳到日本，最後再傳到中國。這篇論文主要目的不在考證底本，而在具體歸納轉譯過程中發生的現象。首先，「轉譯」、「重譯」、「複譯」的混用情形有必要加以釐清，而這種間接翻譯經過多手傳播而被投以懷疑眼光的不良印象，也有必要透過實際的文本閱讀比對，來證實此一印象是否為事實。筆者以此一文本的原著與三種譯本為個案，觀察到相近語言之間的翻譯容易採用直譯及挪用的策略，譯者對風格的偏好傾向容易促成文本的選用及譯介，而層層轉譯的過程，很可能造成修辭效果也層層放大，誤譯與漏譯也可能層層傳承下去。然而，就故事梗概及原著精神來看，經過愈多層的轉手，最終譯作未必跟原作愈不一樣。只經過一層的直接翻譯，遭到大幅增刪改寫的作品所在多有，而間接轉譯的作品，也可能歷經多手傳播卻仍大致保有原作風貌。在這個類似傳話遊戲的過程中，玩家若是盡責，即便偶有失誤，也還是可以順利傳達正確訊息。

綜觀本專題的六篇論文，可以看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譯事活動興盛蓬勃，人與文本都在跨越疆界四處旅行，思想與文化交流頻繁且互相滲透，無論是口譯者或筆譯者

都功不可沒。本專題六篇論文環繞著東亞地區，點出臺灣、中國、日本在近代史上緊密相連的關係，尤其是臺灣與中國，承襲日本或透過日本學習西方的情況十分明顯。但誠如沈國威所言：「迄今為止我們習慣只把日本途徑當作特定時間、空間下引進西方知識的一種特殊現象，強調經由日本傳入的知識本源在於西方，而對於『途徑』的各個側面——建立的時間、機制、社會之反應、通過日本途徑傳入的知識的具體情況以及途徑對知識本身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等，研究的力度尚嫌不足。」² 本專題各篇論文的作者以深厚的研究能力，處理各個文本、語言、時空之間的差異，細緻描寫這條途徑的各種影響，可說適度彌補了上述缺憾。我們也衷心期盼這些研究能夠拋磚引玉，為翻譯研究或觀念史研究帶來更豐富的視角與更深入的觀點。

² 沈國威：〈時代的轉型與日本途徑〉，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頁243-244。